

1238
1919.3
K.27

39530

列 寧

關於資產階級民主和
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与報告

一九一九年三月四日在共產國際
第一次代表大會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В. И. Ленин
ТЕЗИСЫ И ДОКЛАД О БУРЖУАЗН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И ДИКТАТУРЕ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本書是以解放社版“列寧選集”中所載譯文為基礎，根據“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十八卷校訂了一版。

列 寧

關於資產階級民主和
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與報告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書號：1737·787×1092 1/32· $\frac{3}{4}$ 印張：13,000字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15,000 定價：(4) 0.08 元

關於資產階級民主和 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与報告

(一九一九年三月四日在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¹)

(一)世界各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增長，曾使資產階級及其在工人組織中的走狗，拚命去找尋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論據來保護剝削者的統治。在這些論據中，曾特別提出了反對專政和擁護民主的論據。在資本主義的刊物上以及在一九一九年二月舉行於伯爾尼的黃色國際代表會議上都異口同聲地重複着的這些論據，凡是不願意背叛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人都會看得明白，它們全是說謊的和虛偽的。

(二)這種論據首先是運用“民主一般”和“專政一般”的概念，而不談關於哪一個階級的問題。問題的這種非階級的、或超階級的、似乎是全民的提法，就是直接侮辱社會主義的基本學說，即階級鬥爭學說；跑到了資產階級方面去的社會主義者，口頭上承認這種學說，而實際上却忘記這種學說。因為，無論在哪一個文明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都沒有“民主一般”，而只有資產階級的民主；問題不是說“專政一般”，而是說被壓迫階級即無產階級對壓迫者和剝削者即資產階級所實行的專政，其目的就在於克服剝削者為恢復自己的統治而起的反抗。

(三)歷史告訴我們，如果不經過專政的時期，就是說，不

經過奪取政權和用暴力鎮壓剝削者無時不起的最兇猛、最瘋狂、不顧一切的反抗的時期，那末，無論哪一個被壓迫階級，從來沒有得到過統治，而且也不能得到統治。聲稱反對“專政一般”和拼命擁護“民主一般”的社會主義者，現在擁護着資產階級的統治；而在各先進國內，資產階級之奪得政權，是用了許多暴動、國內戰爭、暴力鎮壓帝王、封建主、奴隸主、以及他們的復辟企圖的代價換得來的。世界各國的社會主義者，在他們的書籍中、小冊子中、他們的代表大會的決議案中、他們的鼓動演說中，曾經千百萬次對民衆解釋了這些資產階級革命、這種資產階級專政的階級性。因此，現在假裝談着“民主一般”而擁護資產階級的民主，以及現在假裝喊着“專政一般”而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切叫囂，就是公然背叛社會主義，是實際上跑到資產階級方面而否認無產階級進行其無產階級革命的權利，是恰恰在全世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已經完全破產而戰爭已經造成了革命形勢的這個歷史關頭，去擁護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

(四)一切社會主義者說明了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和資產階級的代議制之階級性，他們所表示了的意思，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曾以最科學的確切性用下面的話所表示過的意思：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無非就是資產階級鎮壓工人階級、寥寥無幾的資本家鎮壓勞動羣衆的一副機器²。現在大呼反對專政和擁護民主的人們中，沒有一個革命者、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過去不在工人面前宣誓過，說他承認社會主義的這個基本原理；可是現在呢，當革命的無產階級醞釀和

運動起來破壞這個壓迫機器和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這些社會主義的叛徒卻把事情說成這樣：似乎資產階級恩賜了勞動者以“純粹民主”，似乎資產階級放棄了反抗而願意服從勞動者的多數，似乎在民主共和國內無論過去或現在都沒有任何資本鎮壓勞動的國家機器。

(五)一切希望被稱為社會主義者的人們在口頭上都推崇的巴黎公社(因為他們知道工人羣衆是熱烈地和誠懇地同情它的)，特別明顯地指出了資產階級代議制和資產階級民主制之歷史的條件性及狹隘性，——這些制度，比中世紀的制度是要進步得多，但在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則必須根本地改變它們。馬克思最正確地估計了公社的歷史意義；正是他在分析公社的時候，指出了資產階級民主制和代議制的剝削性，在這種民主制和代議制下，被壓迫階級在幾年之內只有一次得有权來解決這個問題：有產階級的哪一個代表將在國會內“代表和鎮壓”(ver- und zertreten)人民³。正是現在，當蘇維埃運動已普及於全世界，它之繼續公社的事業已為有目共睹的時候，社會主義的叛徒們卻忘記了巴黎公社的具體經驗和具體教訓，而重複着舊的資產階級的廢話，說什麼“民主一般”。公社並不是一個代議制機關。

(六)其次，公社的意義在於它曾企圖徹底打碎和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官僚的、司法的、軍事的、警察的機關，而以工人的自治的羣衆組織，沒有立法權與行政權之分的組織，來代替它。現代一切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其中也包括社會主義的叛徒違反真理而稱之為無產階級共和國的德國資產

階級民主共和國，都保持着這種國家機關。這樣看來，高呼擁護“民主一般”，其實就是保護資產階級及其剝削的特權，這一點完全明白地再三地証實了。

(七)“集會自由”可為“純粹民主”的要求的典範。凡是沒有脫離本階級的一切覺悟工人，立即就會明白，在剝削者對於推倒他們實行反抗而堅持着自己的特權的那個時候和那種情況下允許剝削者有集會自由，這是荒謬絕倫的。當資產階級還是革命的時候，無論在一六四九年的英國或是在一七九三年的法國，它也沒有把“集會自由”給予招引外國軍隊和“集合起來”組織復辟企圖的保皇派和貴族們。如果現在的資產階級，即老早已經變成反動勢力的資產階級，要求無產階級預先替剝削者擔保“集會自由”，而不管資本家如何反抗對他們的剝奪，那末，工人們對於資產階級的假仁假義，只有置之一笑而已。

另一方面，工人們知道得很清楚，甚至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內，“集會自由”也是一句空話，因為富人擁有一切最好的公共的和私人的建築物，同時又有充分閑暇的時間來集會，並有資產階級的政權機關來保護他們的集會。城市與鄉村的無產階級和小農，就是說，絕大多數人民，既無這些建築物，又無集會的時間，也無人來保護他們的集會。只要事情是這樣擺着的時候，“平等”，即“純粹民主”，就是一種欺騙。要取得真正的平等，要在事實上實現勞動者的民主，首先應當把一切公共的和私人的豪華的建築物，從剝削者手裏奪取過來，首先應當給勞動者以閑暇的時間，應當使武裝的工人們——而不是

帶領着被蒙蔽的兵士的那班貴族們或資本家軍官們——來保護他們的集會自由。

只有經過這種改變之後，才可以談集會自由，談平等，而不至於光是跟工人、勞動者和窮人開玩笑。但是，除了勞動者的先鋒隊，即推倒剝削者（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之外，是沒有任何人可以實現這種改變的。

（八）“出版自由”也是“純粹民主”的主要口號之一。工人們又知道，而且世界各國的社會主義者已經千千萬萬遍地承認了，當最好的印刷所和最大的造紙廠還被資本家把持着的時候，當資本的權力還統治着言論機關的時候——如美國那樣民主制和共和制愈發展，則這個權力在全世界表現得愈鮮明、愈厲害、愈無恥，——“出版自由”是一句騙人的話。要為勞動者、為工人和農民取得真正的平等，取得真正的民主，首先就應當剝奪資本家僱傭作家、收買出版機關和賄買報館的可能性；但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推翻資本的羈絆、打倒剝削者、鎮壓他們的反抗。資本家向來把富人發財的自由，工人餓死的自由，叫做“自由”。資本家現在又把富人賄買出版物的自由，利用財富以製造和假造所謂輿論的自由，叫做出版自由。“純粹民主”的擁護人，在實際上又是富人統治羣衆教育工具的最醜惡的賄賂制度的擁護人，是欺騙人民的騙子；他們用些好听的、漂亮的和非常虛偽的話，使人民離開那具體的歷史任務：把言論機關從資本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共產主義者所要建設的制度，將是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在這個制度下，不會有靠別人而發財的可能性，不會有金錢勢力直接或間接

支配言論機關的客觀可能性，不會有妨害一切勞動者（或不論人數多少的勞動者的團體）平等享用社會的印刷所和社會的紙料的障礙物。

（九）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底歷史，還在大战以前已經告訴了我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標榜一時的“純粹民主”實際上是什麼東西。馬克思主義者向來就說過，民主愈發展、愈“純粹”，則階級鬥爭愈顯露、愈激烈、愈殘酷，而資本的壓迫和資產階級的專政，亦就表現得愈“純粹”。在共和國的法國所發生的德雷福斯案件，在自由民主共和國的美利堅資本家所武裝了的僱傭軍隊之屠殺罷工者，——這些事實以及諸如此類的千百件事實，證明了資產階級枉費心機企圖去掩藏的那個真理，這就是：在最民主的共和國內，實際上統治着的是資產階級的恐怖和專政，每次當剝削者開始看到資本的權力動搖起來的時候，這種恐怖與專政便公開地表現出來。

（一〇）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的帝國主義戰爭，甚至在落後的工人們面前也徹底暴露出了資產階級民主的本性：即令在最自由的共和國內，資產階級民主就是資產階級專政。爲着充實德國或英國一些大富翁的私囊起見，曾殺死了千百萬的人民，就在最自由的共和國內，也實行了資產階級的軍事專政。在戰敗德國以後，這個軍事專政還繼續在協約各國內存在着。正是戰爭最甚地使勞動者張開了眼睛、撕去了資產階級民主的假面具，把戰時的和乘戰爭機會而作一切無限的投機和發財的事情，指示給人民看。爲了“自由和平等”，資產階級進行了這次戰爭；爲了“自由和平等”，軍用品的供給者空前地

大發其財。資產階級的自由、資產階級的平等、資產階級民主的剝削性，現在已被徹底地揭穿了，無論黃色的伯爾尼國際怎樣賣力，也不能在羣衆面前把它加以掩飾。

(一一)在歐洲大陸上最發展的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德國，由於帝國主義德國之失敗而產生的完全共和國的自由，開始幾個月就已向德國工人和全世界指出：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真實的階級本質，究竟在什麼地方。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的被殺害，是全世界歷史上重要的事件，這不僅因為真正無產階級的共產國際的優秀分子和領袖遭兇殺而死了，而且因為對於歐洲的一個先進的國家——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世界範圍內一個先進的國家——來說，其階級本質已經徹底地暴露出來了。如果在社會愛國派的政府之下，軍官和資本家可以隨意殺害被捕的人們，就是說國家政權保護下的人們，而不受處分，那末，能夠發生這種事情的民主共和國，就是資產階級專政。人們對於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的被殺表示憤激，但是他們不懂這個真理，這樣他們也就暴露出自己不是愚昧無知，便是假仁假義。在世界上最自由和最先進的共和國之一的德意志共和國內，所謂“自由”，就是隨心所欲地殺害被捕的無產階級領袖的自由。當資本主義還保存着的時候，是不能不如此的，因為民主制的發展，不是減弱而是加劇了那由於戰爭及其結局的一切結果和影響而達到了沸點的階級鬥爭。

在整個文明世界中，現在都在驅逐布爾什維克，迫害他們，把他們關在牢獄裏；如在最自由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之一——瑞士國內，就是這樣，又如美國等等亦在摧殘布爾什維

克、先進的、文明的、民主的、全副武裝的國家，害怕從落後的、飢寒的、破產的俄國——千百万份資產階級的報紙稱它為野蠻的、万惡的……俄國——出來的幾十個人，在它們那裏逗留；這從“民主一般”或“純粹民主”的觀點看來，簡直是可笑的。能夠產生這種絕大的矛盾的社會環境，其實就是資產階級專政，這是顯而易見的。

(一二)在這種情形之下，無產階級專政，不僅作為推翻剝削者及鎮壓其反抗的一種工具是完全正當的，而且作為防禦引起戰爭並在準備新戰爭的資產階級專政的唯一手段，對於整個勞動羣眾也是絕對必要的。

社會主義者所不明瞭的，並造成他們在理論上的近視、使他們被資產階級的偏見所俘虜、使他們在政治上背叛無產階級的主要的東西，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當這個社會的基礎上所包藏着的階級鬥爭稍稍嚴重地尖銳起來的時候，除了資產階級專政或無產階級專政之外，不能有什麼中間的道路。關於什麼第三條道路的一切幻想，都是小資產者的反動的悲傷情緒。各先進國內資產階級民主和工人運動一百多年來的發展經驗，尤其是最近五年來的經驗，都證明了這一點。整個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的全部內容，也說明了這一點；馬克思主義說明了在一切商品經濟之下資產階級專政的經濟上的必然性，而代替資產階級的，除了資本主義發展本身所發展、繁殖、團結、鞏固起來的階級——即無產階級之外，就沒有旁的人了。

(一三)社會主義者的另一個理論上和政治上的錯誤，就

在於不明瞭：在幾千年的過程中，從古代民主的萌芽時期起，民主的形式，隨統治階級之更迭而必然要起變化。在希臘的古代共和國內，在中世紀的城市中，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內，民主有各種不同的形式和各種不同的應用程度。誰要是認為人類歷史上最深刻的革命，世界上第一次由少數剝削者轉到多數被剝削者的政權的過渡，能夠產生於舊有資產階級國會民主的舊有範圍內，而不要經過激烈的轉變，不要建立新的民主形式，不要建立那種體現着應用民主的新條件的新機關等等，——誰要是這樣想，他就是最荒謬不過的了。

(一四)無產階級專政與其他各階級專政相似的地方，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和一切專政一樣，是由鎮壓失掉政治統治的那個階級的暴力反抗的必要性所引起的。無產階級專政與其他各階級專政——中世紀時代的地主專政，在一切文明的資本主義國內的資產階級專政，——根本不同之點，就在於：地主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是以暴力鎮壓大多數居民的反抗，即勞動者的反抗。反之，無產階級專政，是以暴力鎮壓剝削者的反抗，就是說，極少數居民，即地主和資本家的反抗。

從這裏又可以看出，無產階級專政不僅一般說來必然要有民主的形式和機關的改變，而且恰恰要有這樣的改變，使被資本主義所壓迫的人們，即勞動者階級，得能世所未見地擴大其對民主主義的事實上的享受。

而且，實際上已經造成了的那種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就是說，俄國的蘇維埃政權，德國的蘇維埃制度(Räte-System)，英國的工廠代表委員會(Shop Stewards Committees)⁴，以及

其他各國中別種類似的蘇維埃機關，——所有這些，的確是爲着勞動者階級，就是說，爲着大多數居民而實現這樣一種利用民主權利和自由的實在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就在最完善的和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裏面，也是從來沒有的，甚至與它相近的，也沒有見過。

蘇維埃政權的實質就在於：羣衆的組織，即被資本主義所壓迫的那些階級，就是說，工人階級和半無產階級（不剝削他人勞動而且經常至少出賣其一部勞動力的農民）的羣衆組織，是整個國家政權及整個國家機關之固定的和唯一的基礎。正是那些甚至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內，按法律是享有平等權利而在事實上却被人千方百計地排擠、以致不能參加政治生活、不能享受民主權利和自由的羣衆，現在却經常地和一定地，而且左右一切地參加國家的民主管理。

（一五）資產階級的民主隨時隨地都答應過，一切公民不分性別、宗教、種族、民族，一律平等，但是它無論在哪裏都沒有實現過，而且由於資本主義的統治，也不可能實現；蘇維埃政權或無產階級專政，却一下子就把它充分地實現了，因爲，能够做到這一步的，只有不主張生產資料私有制和不主張爲瓜分和重分生產資料而鬥爭的工人的政權。

（一六）舊的，就是說，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和代議制，組織得正是要使勞動羣衆最不能參加行政機關。反之，蘇維埃政權，就是說，無產階級專政，却組織得要使勞動羣衆能夠接近行政機關。在蘇維埃式的國家組織之下，立法權與行政權的結合，以及以生產單位，如工廠、作坊，去代替地域制的選舉區，

正是爲了這個目的。

(一七)軍隊之爲壓迫機關，不僅在君主國如此，就在一切資產階級共和國，甚至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亦是如此。只有蘇維埃政權，即從前被資本主義所壓迫的那些階級的固定的國家組織，才能破壞軍隊之服從資產階級的指揮，才能使無產階級與軍隊真正融合起來，才能真正實現武裝無產階級和解除資產階級的武裝，不如此，則社會主義的勝利便沒有可能。

(一八)蘇維埃式的國家組織，適應着無產階級即被資本主義弄得最集中和最有教養的階級的領導作用。被壓迫階級一切革命和一切運動的經驗，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我們說，只有無產階級才能統一和引導勞動者與被剝削居民中散漫而落後的階層。

(一九)只有蘇維埃式的國家組織，才能真正一下子打碎和徹底破壞舊的，即資產階級的、官僚的和司法的機關；這種機關，在資本主義之下，甚至在最民主的共和國裏面，也是保存着的，而且也必然要保存着，它實際上成爲對工人和勞動者實行民主主義的最大障礙。巴黎公社在打破這種機關的道路上走了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第一步，蘇維埃政權則走了第二步。

(二〇)消滅國家政權，就是一切社會主義者——馬克思也在內，而且是以他爲首領——所規定的目的。不實現這個目的，則真實的民主，就是說，平等與自由，便無從實現。但是，實際上只有蘇維埃的或無產階級的民主，才能導向這個目的，因

爲当其吸引勞動者底羣衆組織經常地和一定地去參加國家管理時，它就會很快地開始準備一切國家的完全衰亡。

(二一)集會於伯爾尼的社會主義者的完全破產，他們之完全不懂得新的，即無產階級的民主，從下列的事實中表現得特別明顯。一九一九年二月十日，在伯爾尼舉行的黃色國際的國際代表會議會由柏蘭庭宣佈閉幕。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一日，在柏林，在該國際的參加人的報紙“自由報”（“Die Freiheit”）⁵上，曾發表了“獨立”黨告無產階級的宣言。在這個宣言中，曾經承認謝德曼政府的資產階級性，並責備這個政府蓄意取消被稱爲革命的擔當者和保護者（Träger und Schützer der Revolution）的蘇維埃。該宣言並提議使蘇維埃合法化起來，給它以國家的權利，給它以取消國民會議決議的權利，而把問題提交全民公決。

這樣的提議，就是擁護民主而不懂民主的資產階級性的理論家在思想上的完全破產。想把蘇維埃制度，即無產階級專政，和國民會議，即資產階級專政聯結起來的令人可笑的企圖，徹底暴露出黃色社會主義者和社會民主派的思想的貧乏、他們的小資產者的政治上的反動性、他們對於新的無產階級民主的不可遏抑而日益生長的力量所作的畏縮的讓步。

(二二)伯爾尼黃色國際大會上的大多數人曾反對布爾什維主義，但因害怕工人羣衆，還不敢正式表決反對布爾什維主義的決議案；他們反對布爾什維主義，從階級觀點上看來，是正當的。正是這個大多數，與俄國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以及德國的謝德曼輩，完全取一致行動。俄國的孟什維克和社

会革命党人，怨恨布爾什維克通緝他們，而企圖掩蓋這個事實：這些通緝辦法，是由於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國內戰爭中擁護資產階級反对無產階級所引起的。同樣，謝德曼輩和他們的党，也已經在德國証明了，他們在國內戰爭中也是擁護資產階級來反对工人的。

因此，伯爾尼黃色國際大会的大多數參加人，曾經表示要反对布爾什維克，這是完全自然的。在這一點上所表現的，不是擁護“純粹民主”，而是那些人的自衛，這些人知道並且感覺到，在國內戰爭中他們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來反对無產階級的。

所以，從階級觀點上看來，不能不承認黃色國際大会上大多數人的決定是正當的。無產階級应当不怕真理，面對真理，並且從這裏得出一切政治結論。

同志們！對於最後兩條我想再補充幾句話。我想，那些要向我們做一個關於伯爾尼代表會議的報告的同志，會把這個問題更詳細地告訴我們。

在整個伯爾尼代表會議的過程中，關於蘇維埃政權的意義，連一個字都沒有提到。在俄國，我們討論這個問題已有兩年之久。一九一七年四月，在我們黨的代表會議上，我們已經在理論上和政治上提出了這個問題：“什麼叫做蘇維埃政權，它的內容如何，它的歷史意義何在？”我們討論這個問題，差不多有兩年了，而在我們黨的代表大會上，並通過了關於這個問題的決議案⁶。

柏林的“自由報”於二月十一日發表了告德國無產階級的

宣言，在該宣言上署名的，不僅有德國獨立社會民主派的領袖們，而且還有獨立派黨團的全體成員。一九一八年八月，這些獨立派的最大的理論家考茨基在他的一本小冊子“無產階級專政”上寫道，他是擁護民主和蘇維埃機關的人，但是蘇維埃應當只有經濟上的意義，而絕不能認作國家的組織。在十一月十一日和一月十二日的“自由報”上，考茨基重複着這些話。二月九日發表了希法亭的文章，他也被認為是第二國際的最大的權威理論家之一。他提議在法律上，即用國家的立法手段，把蘇維埃制度跟國民會議結合起來。這是二月九日的事。到二月十一日，獨立派全黨都通過了這個提議，而以宣言的形式發表出來。

不管國民會議已經存在着，甚至在“純粹民主”已經實現了之後，在獨立社會民主派的最大的理論家已經聲明過蘇維埃組織不應當成為國家的組織之後，不管所有這一切——這些人又動搖起來了！這是證明這些先生們真正絲毫不懂新的運動及其鬥爭的條件。但是，這又證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引起這種動搖的，必定有其條件，有其原因！在這一事件之後，在俄國這次幾及兩年的勝利的革命之後，人們向我們提出如伯爾尼代表會議所通過的那樣的決議案，即其中絲毫沒有提到蘇維埃及其意義的問題，並且在會上，沒有一個代表有一言一語涉及這個問題，——此時我們有充分的權利可以斷言，所有這些先生們，作為社會主義者和理論家，據我們看來，是已經死亡了。

但是同志們，在實際上，從政治的觀點上來看，這是證明

羣衆中正在發生大的變化，——因爲這些獨立派，向來在理論上和原則是反對這些國家組織的，現在他們忽然提出這樣的蠢東西，如國民會議和蘇維埃制度的“和平的”結合，就是說，資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結合。現在我們看見，在社會主義方面和理論方面，他們這些人是如何地遭到了破產，而在羣衆中則發生了何等大的變化。德國無產階級的落後羣衆，正在向着我們走來，而且已經跑到我們這裏來了！因此，從理論的和社會主義的觀點看來，德國社會民主派的“獨立黨”、即伯爾尼代表會議的優秀部分的意義，完全等於零；可是，它還有相當的意義，其意義就在於：對我們來說，這些動搖分子可以作為無產階級落後部分的情緒的標誌。我相信，這次代表會議的最大的歷史意義，也就在這裏。在我們的革命中，我們也遇到過這類的事情。我國孟什維克所走過的發展道路，恰恰和德國獨立派理論家所走過的一樣。在開始的時候，當他們在蘇維埃中佔了多數的時候，他們曾擁護蘇維埃。只有在那時候，可以聽到“蘇維埃萬歲！”，“擁護蘇維埃！”，“蘇維埃就是革命的民主制！”。可是，當我們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中得了多數的時候，他們便唱起另外的調子來了：蘇維埃不應當和立憲會議同時存在；而各色各樣的孟什維克的理論家，曾提出了幾乎和上述的提議相同的那些提議，比方：把蘇維埃制度和立憲會議結合起來，把蘇維埃包括於國家的組織中。這裏再次表示出：無產階級革命的總進程，在全世界上都是一樣的。起初是自發的成立蘇維埃，然後是它們的普及和發展，再後是在實際上發生一個問題：蘇維埃呢，還是立憲會議或國民會議，或資